



亚洲研究丛书

东北亚国家 集体身份建构与区域合作

——一种区域整体视角的研究

**Collectiv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of the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谢桂娟/著



东北亚区域 生物多样性与区域合作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Collaborative Studies on Biodiversity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of the Northeast Asia Region

植物所



亚洲研究丛书

东北亚国家 集体身份建构与区域合作

——一种区域整体视角的研究

Collectiv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of the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谢桂娟/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与区域合作：一种区域整体视角的研究 / 谢桂娟著。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6
(亚洲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3339 - 4

I . ①东… II . ①谢… III . ①东亚 - 研究 ②区域经济合作 - 研究 - 东亚
IV . ①D731 ②F114.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6265 号

· 亚洲研究丛书 ·

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与区域合作 ——一种区域整体视角的研究

著者 / 谢桂娟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冯立君 王玉敏

电子信箱 / bianyibu@ ssap. cn

责任校对 / 岳书云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印 张 / 14.5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 251 千字

版 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印 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339 - 4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本书是延边大学“十一五”“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朝韩日经济与东北亚地区国际合作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随着我国同朝鲜、韩国、日本三国关系的日益紧密，以及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东北亚国际合作问题成为我国政府以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如何加强我国与朝鲜、韩国、日本三国之间的合作，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是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和外交战略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实现我国东部边疆稳定发展的重大研究课题。

国内外学者从当代现实利益角度出发，对东北亚地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国际物流、劳务合作、图们江流域国际合作开发、朝核问题、地区安全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大都是集中在专门性领域，其研究的深度还是远远不够。东北亚地区国际合作的实践机理、政治法律及其人文地理环境的综合性研究还不够深入。特别是朝鲜、韩国、日本经济本体的基础性理论研究、中朝韩日经济关系史的研究不够系统和全面，国内还没有真正形成共同的研究平台和解读体系。同时，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现实与未来变化对边疆跨境民族聚集地区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尚处于研究的空白状态。

针对东北亚区域政治经济发展变化和区域国际合作的现实状况，区域国际合作理论研究应紧密结合新时期我国国家发展战略，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紧紧围绕中朝韩日经济发展与东北亚地区国际合作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创新性的理论研究，这既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需要，也是新时期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开放程度的战略需要。

第一，加大对朝韩日三国经济本体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及这些国家与我国的经济关系研究，系统研究朝韩日三国经济发展内外环境的变化，准确解析

三国经济发展变化与我国经济发展变化的互动规律，构建国内共同研究的平台和解读体系，这些研究既是学科理论创新与发展的重大需求，也是新形势下建立我国东北亚地区国际合作参照系、“思想库”的重大需要。

第二，推动中日韩战略伙伴关系和战略互惠关系发展。中韩建交以来两国经济关系得到飞跃性发展，中韩关系已经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中日关系在曲折发展中已经升格为战略互惠关系。如何加强中韩日在能源、环境、产业、贸易、投资、金融与科技等领域的深入合作，加强新时期朝、韩、日对外经济战略走向及其内外影响的理论研究，是我们理论界需要给予重视和进行重点研究的重大问题。

第三，高度关注和深化有关朝鲜半岛政治经济问题的研究。这里既要继续跟踪研究美欧日俄等世界大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朝韩政治关系的新变化，也要密切关注朝鲜的政治体制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在复杂多变的大国关系中把握朝鲜半岛问题的本质，为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和有价值的参考。

第四，亟待加强东北亚地区国际合作中的法律问题研究。目前需要深入研究中朝韩日经贸关系中的法律纠纷以及开展东北亚各国出入境与非法出境、中国出入境法律、东北亚各国对外国人法律地位的规制、东北亚各国跨境犯罪的法律规制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在东北亚经济合作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五，深化“沿边、沿江”开发开放研究，推动沿边沿江开发开放新发展。吉林省东部沿俄、朝边界设有14个口岸和11个临时过货点。如何开发开放这一地区具有重大的战略与现实意义。尤其是这一地区是受朝鲜半岛政治经济影响较大的地区又是跨境民族聚集地区，存在许多诸如“国际移民”问题、“脱北者”问题等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

针对上述这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创新性研究，为党和国家制定有关战略、政策以及开展国际合作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撑，这是本项目研究的总体目标，也是我们出版这套系列著作的目的所在。

2009年8月30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标志着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与东北亚地区国际合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需要以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保障，有效地参与东北亚地区国际合作是实现中国图们江

区域合作开发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中国实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战略为东北亚地区国际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学术界对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法律、人文地理、民族、文化问题展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这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深入研究东北亚地区各种历史与现实问题，而且也为我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双边关系和推动东北亚地区国际合作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

从国内外研究的发展趋势看，基于我国与朝鲜、韩国、日本三国关系的进一步提升以及东北亚地区国际合作的新形势，对朝韩日经济本体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将进一步得到细化，有利于形成共同性的理论创新平台和解读体系；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对中朝、中韩、中日、日韩经济关系的应用研究将成为重点；从政治、经济、法律、人文地理、民族、文化、管理等多种关系的互动角度，研究东北亚国际合作机制和模式将实现研究范式的变革；实现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和计量研究相结合将突破传统研究的局限性，实现研究方法创新。这些趋势性的变化将有助于实现本项目的理论创新和应用研究的新突破。

延边大学在朝韩日经济、朝鲜半岛问题以及东北亚等研究方面具有比较长的历史，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优势，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近几年来，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学校的支持下，我校的东北亚问题研究又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中在项目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这套“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系列著作，就是其代表性成果之一。这套系列著作的研究涵盖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人文地理学、民族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是国内有关东北亚问题的涉猎范围广、规模大的系列性最新研究成果，也是对国际问题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一种有益探索。希望这套系列著作的出版能够把东北亚问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的论述如有不妥之处，诚恳地希望不吝指正。

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金华林

2011年8月

目录
CONTENTS

序 / 1

绪 论 / 1

- 一 建构主义理论及在本书中的具体运用 / 3
 - 二 本书研究的时空范围 / 20
-

第一章 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及合作传统的历史考察 / 27

- 一 17世纪上半叶之前东北亚自足一体时期
 - （集体）身份认同 / 28
- 二 17世纪上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东北亚内部动荡时期
 - 身份认同逐渐瓦解 / 40
- 三 19世纪上半叶到19世纪末东西方文化碰撞时期
 - 西方国家身份的追求 / 45
- 四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日本主导时期
 - 日本与东北亚其他国家敌视身份的形成 / 53
- 五 冷战时期东北亚国家两大“敌对”身份的建构 / 55
- 六 东北亚国家合作传统的历史考察 / 58
- 七 本章小结 / 70

第二章 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及区域合作现状分析 / 72

- 一 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缺失的现状 / 73
 - 二 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不均衡状态 / 81
 - 三 内源性影响因素 / 86
 - 四 外源性影响因素 / 94
-

第三章 东北亚各国自我身份建构与区域合作 / 98

- 一 中国负责任（地区）大国身份的建构 / 99
 - 二 日本亚洲国家身份的回归 / 110
 - 三 摆脱依附性、增强主体性将是韩国身份的建构目标 / 117
 - 四 融入国际社会将是朝鲜国家身份的建构目标 / 123
 - 五 俄罗斯（地区）大国身份的建构 / 129
-

第四章 东北亚国家间积极角色身份建构与区域合作 / 138

- 一 中日间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 / 139
 - 二 中韩间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 / 147
 - 三 日韩间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 / 151
 - 四 中俄间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 / 153
 - 五 日俄间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 / 157
 - 六 韩俄间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 / 158
 - 七 东北亚国家间积极角色身份建构中存在的难题 / 160
-

第五章 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形成）

- 区域合作成功的标志 / 166
- 一 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的内部动因 / 167

二 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的外部动力 / 177

三 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的主要障碍 / 179

四 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的具体路径 / 182

结 论 / 198

参考文献 / 201

后 记 / 220

绪 论

在影响国际关系的各种因素中，物质实力固然是最有力的变量，但主观因素，包括文化、观念以及认同，同样也是基本的变量，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更为持久。也正因为如此，冷战结束后，文化、观念与认同作为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及影响备受瞩目。建构主义的身份政治理论就是在承认国际社会物质结构的前提下，重点强调由文化、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构成的社会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并着重研究行为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建构主义看来，文化、规范、认同三个概念紧密相关，文化通过建构共有观念（文化）塑造国家这一国际社会行为体的身份归属；行为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明晰彼此的身份特征，界定“自我”与“他者”，以及各自的利益，建立各种行为规范；规范不仅对行为体具有因果性作用，更具有建构性影响。而区域合作必然涉及规范问题，规范不但能够因果性地规定行为体的外在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影响行为体的内在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的深度和广度则主要取决于规范内化的程度。建构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温特认为，在国家之间的多种身份认同中，只有集体身份才能保证国家之间持续的、真实的合作。由此可见集体身份对区域合作的重大影响，反过来国家间集体身份的建构和形成也同样离不开区域合作的互动实践。本书选择温特的建构主义作为理论依据，以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与区域合作的互动关系为总体分析框架，在考察、分析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认同及区域合作的历史、现状基础上，着重对

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建构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本书尤为关注东北亚国家在互动实践中所形成的共有知识（即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社会学习而共同拥有的规范、制度和规则等），这种共有知识或集体知识，也可称为国际政治文化。这种共有知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合作文化的构成部分，它在区域化、一体化进程中扮演何种社会角色等，这些都是近年来引起学界高度重视的研究课题。笔者认为，从国际政治文化的深层视角来解读区域化、一体化的动力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历史上的东北亚，曾经存在文化统一、政治上相互承认的身份认同。步入近代，自民族国家观念形成以来，东北亚各国对自己民族或国家认同越来越强，各国相互之间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意识越来越淡漠。时至今日，东北亚区域在物质层面已经形成了较深的经济相互依赖，但在集体身份层面，该地区国家集体身份严重缺失^①。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缺失的现状使得强调文化和认同的建构主义有了充分的解释空间，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上的东北亚国家之间初次相遇所呈现的并不是霍布斯文化状态，相反，个别时期（如明朝时期的中朝关系）却再现了康德文化的曙光。在一定意义上，历史上东北亚地区独特的发展逻辑翻转了温特关于国际政治文化线性发展逻辑^②，使建构主义理论明显地表现出解释乏力的困境。因此，本书虽然选择了温特的建构主义作为理论分析工具，但并没有拘泥于这一理论，而是结合国内外学者对建构主义的评价以及补充和发展，尤其是结合东北亚国际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对建构主义的一些概念或观点做了变通性的解释，以期能够使本书的研究基础更为可靠，同时也希冀能够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正在努力建构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③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此，在对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与区域合作这一课题展开具体论述之前，有必要对建构主义理论、本书的框架结构以及本书研究的时空范围做一介绍。

^① 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的缺失可参见谢桂娟《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的缺失及原因》，《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205~208页。

^② 对此，笔者曾撰文阐述过。参见谢桂娟《东北亚中日朝（韩）三国间身份的历史考察》，《东疆学刊》2012年第1期，第57~63页。

^③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86页。

一 建构主义理论及在本书中的具体运用

(一) 建构主义及简单评价

建构主义是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主要流派，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族中的最新成员之一。它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共同组成了国际关系学界的“三驾马车”^①。如果说现实主义关注的对象是权力，自由制度主义强调的是制度，那么建构主义则把文化（观念）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在当今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普适性分析模式^②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仍然十分普遍的情况下，以反现实主义面目出现的建构主义，在给国际关系领域带来一股清新空气的同时也面临着与现实主义等主流理论一决高下的挑战和压力。

建构主义是一个流派纷呈的“大家族”的统称，被学界公认的主要有四大流派^③。其中以温特为代表的一派可称为主流建构主义，因为他们集各家之大成，最有望对新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构成实质性挑战，同时也代表了建构主义的发展方向。本书也主要采用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为理论依据。

亚历山大·温特的社会（结构）建构主义是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最

^① 自秦亚青教授在《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理论体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 6 期）一文清晰勾勒出三大流派的核心特征后，在国内国际关系学界“三足鼎立说”或“三驾马车说”就被普遍接受了。但在国外，建构主义能否成为主流国际关系至今仍存有争议。

^② [美] 莫顿·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薄智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 6 页。

^③ 建构主义的四大流派，即以阿希利为代表的一派为激进建构主义，温特一派则可称为主流建构主义；另外两派一是以拉吉为代表的现代性建构主义，既反对完成的后现代主义，也反对向主流理论的过分妥协，不期望构筑一个完整学说体系，而在一些具体的理论领域如国际权威、国际制度化、国际合法性、时间性与空间性对国际政治研究的意义等方面颇有建树，最后一派是女权主义建构主义，它与以上三派均有联系，但更多地偏向激进建构主义，它认为国际政治本质很大程度上是由性别化的男性统治、社会态度及其互动关系建构而成。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98; 转引自郭树勇、叶凡美《试论建构主义国关理论及其社会学渊源》，《国际观察》2002 年第 1 期，第 1~6 页。

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其标志性成果就是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本书中多次引用的也就是这部著作中的观点。建构主义之所以能够迅速兴起，西方主流观点认为，一是新现实主义对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现实的解释乏力^①；二是西方主流理性主义理论研究议程和核心假定的趋同^②；三是学术领域的社会学转向和语言学转向^③。在国内，在对上述观点基本认同的基础上，又有学者提出新的见解，如著名学者秦亚青教授认为，建构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国外和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迅速发展成为最有活力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对“意义”的哲学追问，或者说思想界出现了“意义转向”的趋势^④。的确，建构主义把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推向哲学层面，从最根本的问题入手探讨国际政治的内涵；建构主义把国家比拟为人，从社会角度探讨社会层面的关系。“我是谁”、“我们是谁”这一身份定位问题本身就是哲学本体论问题，因此，从哲学高度来把握建构主义兴起的渊源，与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温特的主张也是相符的。

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把国家作为“经济人”看待有所不同，温特把国家“拟人化”，力图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使人的能动性、社会性和实践性体现出来，因此也使政治的本意体现出来^⑤。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温特的建构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而且是一种涉及国家本体地位的（深层次）哲学思考^⑥。

因此，温特在采用社会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同时，采用了理念主义的本体论，强调观念、文化、认同等因素的重要作用。在国际关系领域，温特认为存在三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相应

① [美]卡赞斯坦、基欧汉、克拉斯纳主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3页。

② Ole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ll, Ken Booth, and Mays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9–185.

③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1998: 171–200; Jeffrey Checkel,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50 (1998): 324–348.

④ 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1~23页。

⑤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37页。

⑥ 这是温特本人的看法。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37页。

地，国际体系也存在着三种主要模式：以“人为战、弱肉强食”为主要内容的霍布斯式国际体系，以主权制度相互尊重和武力手段有限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洛克式国际体系，以及不以武力为解决彼此间争端的手段、奉行集体安全的康德式国际体系。建构主义认为，体系是可以转换的，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化以及自我约束等四个因素是目前国际体系转换的关键性变量，其中前三者是有效因素，后者是助然（许可）因素，助然因素参与的可能性力度越大，有效因素就越能发挥作用，体系转换的可能性就越大^①。

温特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虽然是重要的因素，但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是国家身份；国际体系结构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但是，国际体系结构的核心内容是观念分配即体系文化，而不是物质实力的分配。温特建构主义是体系理论，体系文化是其主要的构成性因素，体系文化构成了国家身份，国家身份建构了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决定了国家行为^②。国际政治文化、国际规范、身份认同是建构主义的基本概念。文化、规范与身份皆由社会建构而成，均指国际行为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共识即共有知识。离开了这些共有知识，人们就无法解释国际关系中任何事项的意义。在权力结构与信息环境一定的情况下，文化的意义就会明显上升。

温特不仅把文化、观念引入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而且赋予国际政治中的文化以崭新的含义，即作为共同知识和集体知识的文化。这里的文化指的是国际体系文化，即国家间通过社会实践互动产生的共有观念、共有期望或共有知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建构主义的观念是共有观念，也就是文化。在建构主义理论中，观念与文化是同一个概念。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当‘冷战’这个文化形态形成之后，美国人和苏联人就有了共有的信念：他们互为敌人。这个信念帮助确立了他们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的确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冷战”。温特进一步指出，文化之所以成为文化，也必须具有这种再造能力^③。根据温特的观点，国际政治中的文化是共有知识，即行为体相互之间关于对方理性程

^①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334页。

^②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12页。

^③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81页。

度、战略偏好、信念以及外部世界状态的认知。

就国际社会而言，文化是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即国家之间在社会实践的互动中形成的共有知识，即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等；而就文化对行为体的影响而言，文化不仅指共有知识对行为体的影响，也指一个国家内部的文化即私有知识对行为体的影响。但不论就哪个层次来说，更加强调的依然是作为共有知识的文化。正如郭树勇教授所主张的，国际政治文化是国际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所达到的，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国际道义、战争与和平、生存与发展、国际交往、国际权威与国际治理等一系列关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所拥有的最低限度的共识^①。也就是说，国际政治文化包括绝大部分国家所遵循的全球性国际制度、联合国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及有关国际政治运作的理论认知、观念信仰、基本态度和价值认同等。

根据本人的理解，作为共有知识的文化，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其中最主要的作用有两点：一是建构国家身份与利益。国家身份不是给定的，是由观念或文化建构而成的。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国家利益主要是由单位层面的因素即行为体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是特定历史文化环境的产物。“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历史剧变本身，而是那些经由政治行为体反复阐释的事件所产生的记忆与信念给整个集体留下的烙印。”^② 国家利益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是特定历史文化环境的产物，物质实力要通过观念结构才有意义。国家身份是由国际和国内两个社会、两个制度环境塑造的。用温特的话来讲：“身份建构利益，利益决定行为。”^③ 也就是说，“敌人”身份会界定分歧的利益，进而塑造冲突的政治学（politics of conflict）；而“朋友”身份则会界定一致的利益，进而建构合作的政治学（politics of cooperation）。二是促进国际合作。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国际关系的世界并非一个纯粹的物质世界，而是一个社会世界。在这个社会世界里，每一个行为体都不可避免地要身处一定的社会规范结构和社会网络之中，因而，其行动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规范的规约和构成性影响。换言之，规范具有规劝和说服行为

① 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2001，第310页。

②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92.

③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8.

者做社会所期望之适当行为以及重塑行为者利益观念之功能。当然，并非所有的规范都能够增进认同、促进合作，也并非所有的规范都是合作性和非暴力性的，“共有观念可以是冲突性的，也可以是合作性的，所以，敌人和朋友同样表示了角色身份”^①。

建构主义的最大贡献是强调文化对于身份和利益的作用。文化（观念）决定国家间身份。温特把身份定义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这意味着身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但是这种自我领悟的内容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一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这个行为体的自我领悟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所以，身份也会有一种主体间性或体系特征。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身份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温特重点讨论了四种身份：个人或团体、类属、角色、集体。个人或团体身份指行为体具有独立的实体的意义，类属身份将行为体归入特定的类别，角色身份使行为体间的互动产生了共有期望，而集体身份则具有认同的意义^②。温特主张，国际政治中应主要研究后两种身份即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因为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关系到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社会化、制度化以及国家间互动作用和互相承认的问题，而个人或团体与类属身份主要涉及国内政治的社会运动与政治体制的选择，属国内政治学的范畴，不会影响到国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与国际体系性质^③。本书中东北亚各国自我身份，指的是国家的“个体身份”，但其含义与温特定义的个体身份有所不同，主要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实际上类似于温特定义的角色身份）；东北亚国家间身份，主要指温特的三种文化状态下的身份即国家之间是敌人还是对手抑或是朋友；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是温特意义上的集体身份，但本书把温特定义的集体身份分为高低两个层次，低级层次上的集体身份只用来分析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历史考察部分，其他部分中集体身份的界定是从高层次来谈

^①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24页。

^②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20~224页。

^③ 温特的这种观点已经受到了批评，如以杰弗里·切克为代表，认为温特理论没有指出国内政治在国际体系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温特的理论观点导致了对国内施动性的忽视，结果是建构主义虽然在奠定行为和身份理论的宏观基础（规范和社会内容）方面富有意义，但在微观层面上却相当疲软。温特理论无法系统地分析规范是怎样与施动者联系在一起的。